



2011年过去,短篇小说还是水波不兴,依旧是一个平常年景。优秀作品虽然不少,但却鲜有那种突破性、原创性的力作和精品。在各个方面的探索没有止步,但在文体自身的调整、变革上未见明显成效。短篇小说近年来的发展是稳健、扎实的,也涌现了一批颇见功力、读者喜欢的佳作,在思想和艺术上并不逊于中长篇小说。但短篇小说在整体上的表现是消沉、软弱、被动的。

展现广阔的现实生活

阅读2011年的短篇小说发现,以往那种作为主流的现实主义作品在锐减、在演变。从宏观看,表现现实生活的作品并不少,切入的社会面也很宽,但仔细观察就感到,那种直面严峻现实、具有思想力度的作品寥寥无几。今天,整个文学格局中的现实主义主潮并没有断流,但表现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的重心,已转移到更宽泛的社会和日常生活方面,努力揭示现实生活本质规律的追求,已让位给了对生存状态和人生况味的洞察体验。文学的“大叙事”变成了“小叙事”。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在泛化、在弱化。

当下的中国社会现实,问题更为繁多,矛盾更加严峻。我们并不缺乏有社会良知和忧患意识的作家,因此现实主义力作总会涌现出来,而这类作品往往出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之手。刘庆邦始终在关注底层社会问题和底层人物命运,《月亮风筝》是他2011年的代表作。小说表现了中国现代化、城市化的进程中,农民、乡村所付出的沉重代价。农民工任海生在煤矿的透水事故中死亡,他的家庭瞬间“天塌地陷”。但可恶的是,作为强权一方的煤矿和煤老板,不按有关法规处理,而是采用“逃避”和“私了”办法,多给任海生的妻子10万元,让她保守秘密,一人承担。于是这位善良、软弱、愚昧的农家妇女,遭遇了精神崩溃、家人状告、人财两空的巨大悲剧。弱势的农家妇女在强权面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。作家在这一人物身上寄予了深切的理解和悲悯。王祥夫擅长写乡村社会的民情风俗,在逼真琐碎的生活情景中,往往蕴含着重要的社会现象和问题。《办喜》中写镇里的王镇长和煤矿矿长刘继文两家在同月给儿子办婚事。在矿长给镇长送礼钱、送唱戏、镇长给矿长下请帖、请赴宴等一系列活动中,我们窥见了官员与商人心理上的算计、较量,官商之间政治、经济上的交易、利用和勾结等层层内幕。

所谓现实主义创作,并不局限在重大题材和重要问题,写更广阔多样的社会生活同样可以成为上乘之作。须一瓜的《丰满的一天》就是一篇题材新颖、情节曲折、人物鲜活、手法娴熟的优秀作品。作品写的是当下十分火热的鉴宝故事。一碟一碗两件残破的古瓷器,早已被主人淡忘,实际上“一钱不值”。但在如火如荼的鉴宝氛围中,在掮客的摇唇鼓舌下,却被当做价值连城的宝贝。作者用夸张讽刺的手法,揭示了现实的荒诞、虚无,人心的躁动、功利。艾玛的《一只叫得顺的狗》,以狗的命运为线索,映照出了派出所长、说书艺人、年轻警员等的生活情状和心理演变,以及世态沧桑和岁月无情,蕴涵着无尽的社会人生况味。赵德发的《转运》通过一场道观的“本命年转运法会”闹剧,揭露了金钱铜臭对宗教圣地的侵蚀,一些假住持、假道长通过弄虚作假愚弄信众,从中牟利。这些作品都有着较高的现实意义和审美价值。

探究人性的优秀之作

短篇小说作为一种灵活、精粹的艺术文体,更容易进入人们精神灵魂的“内宇宙”。近年来表现人的情感精神的短篇小说大量增加,且涌现了大批力作和精品。这类小说,一面揭示大变革时期人情人性的变异和走向,一面用现代思想观念给予审视和剖析,表现了一种可贵的精英立场和意识。但同时也要看到,在写人性、欲望的旗号下,那种低俗的、丑陋的东西也乘虚而入,先是在中长篇小说上蔓延,现在又向短篇小说渗透,这是需要格外警惕的。

人性是一个神秘莫测而难以把握的世界,揭示人性的奥秘始终是作家乐于挑战的课题。表现人性所达到的高度,也标志着作家思想和艺术的高度。在2011年的短篇小说中,我们读到了几篇探究人性的优秀之作。赵本夫的《临界》既是一篇心理小说,也是一篇哲理小说。主人公公四毛为了对得起父亲的信任和自己的良心,长期坚持做好人好事,却屡屡被冤、被扒、受辱。众口铄金、善有恶报,四毛的心理和精神终于崩溃,决心去做一回坏人坏事,毁掉了他一生的形象和信念。小说蕴含着一个深刻的人性和社会主题:在一个好坏不分的社会环境中,做好人是艰难的,当他的善长期得不到认同甚至被误解时,人性之善就会转变为人性之恶。马晓丽的《杀猪的女儿》探索的是更纯粹的人性变异:一个柔弱和善的女子在长期的杀猪生涯中,被扭曲了人性,最后竟杀死了自己的丈夫。“恶”的种子一旦播下,在特定的环境中,就会突然萌发。邓一光写城市人的精神世界比起写农民工的生存状态,显得更为得心应手。《深圳在北纬22° 27' -22° 52'》描写的是对白领夫妻疲于奔命的日常工作和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,现代都市使他们丧失了人的感觉、乐趣和思想,他们只有在梦中,才能实现人性向自然的回归:男人变成飞奔的野马,女人变成飞舞的蝴蝶。三篇作品,题材新颖、构思精巧、主题锐利,是难得的佳品。

在表现婚姻题材的小说中,都市故事占了很大比重,且大多写的都是婚姻的迷失、变易和破裂,由此可见都市人情感精神危机之深重。罗伟章的《细浪》以中年女性王燕做隆鼻美容术为“窗口”,撩开了成功人士的心理情感一角,她们向年轻和美丽,但人造的容貌却让她们厌弃。钟求是的《饭依》写的是现代家庭的夫妻,在享受了太多的锦衣玉食,走过了漫长的婚姻之路后,对清心寡欲的佛教境界的“饭依”。盛琼的《像植物一样活》表现了现代女性对婚姻家庭更决绝的反叛。她们对美满的婚姻、富裕的家庭已不再留恋,她们厌倦、恐惧琐碎而庸俗的婚姻生活,因而离婚出走,“拒绝做动物,拒绝欲望”,要“活得像植物一样,芬芳、洁净、蓬勃”。在现代都市,物质生存已逐渐不是问题,而精神生活却困境重重,这些小说给读者一种新的启发和思考。

在叙述家庭故事的作品中,金仁顺的《梧桐》和滕肖澜的《天堂再现》是两篇值得称道的优秀作品。前一篇作家描绘了一幅逼真、鲜活、带有市井韵味的家庭生活图画,从各种人物的精神情感以及相互交往中,捕捉到尘世中最珍贵的亲情和爱情,给庸常、黯淡的日常生活注入一脉温暖的亲情。《天堂再现》的作者则深入到了一个严酷的生命和伦理主题中,让一个柔弱、贤惠的妻子去实施残酷丈夫的“安乐死”。在家庭的毁灭、丈夫的剧痛中,这位妻子作出了无畏的选择,并用

亮点与问题

——2011年短篇小说综述 □段崇轩

“同归于尽”的方式完成了两个年轻生命的“涅槃”。

在表现情感精神世界的短篇小说中,既有格调高雅的优秀作品,也有部分粗制滥造的低俗之作。譬如一些描写多角恋、一夜情、婚外恋的作品,一味渲染性和欲望,损害着短篇小说的典雅品格,这种倾向是应当注意的。

人物塑造的成就与不足

现在短篇小说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?我以为是人物塑造的问题。读过一两百篇作品,那种鲜活、新颖、有深度的人物形象很难遇到几个。有些人物形象,要么是模糊的影子,要么是理念的木偶,很难留下深刻印象。短篇小说人物淡出的问题已受到众多作家和评论家的关注,但多年来并没有得到扭转。这正是短篇小说难以重振的主要原因。

在2011年的短篇小说中,我们也看到了作家在人物塑造上的努力。尽管鲜明而结实的人物不是很多,但也有一批。对于短篇小说,虽然不能要求都去写性格化、典型化的人物,但文学实践证明,短篇小说完全可以写出杰出的典型人物,这样的形象在今天依然有强劲的生命力。关仁山《锁子里的打碗花》可谓一篇精心塑造人物的现实主义力作。农民工形象在当下的短篇小说中比比皆是,但一般写得较为单薄、浅淡,正面品格着笔较多,负面性格浅尝辄止。而关仁山笔下的农民工,不仅显示了作为农民的优秀性格,更揭示了身为农民的卑劣品行。主人公张五可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中,身份逐渐转换,从蹬三轮车的勤劳善良的农民工,到生活悠闲、妄自尊大的富有的看门人,再到偷物又骗色的盗窃者,最后又回到辛苦而卑微的三轮车夫。勤劳、善良、聪明以及自私、贪婪、狡猾、虚荣等性格和品性,既矛盾又统一地凝聚在张五可这个人物身上,而聪明、大胆、执著是他作为底层人物的核心性格。这一形象的社会内涵和审美价值是值得充分肯定的。

短篇小说中的人物,除了现实主义的性格化人物外,还有赋予诗意图象化人物,突出某种性格的类型化人物,着力刻画一种心理、精神的心理型人物、象征型人物等等。其人物塑造的天地是非常广阔的。李浩的《爷爷的“债务”》描绘了一位忠厚仁义、执拗践诺的爷爷的形象,但作家又对这种传统品格给予了形象的解构,使这一形象变得丰富而复杂起来。温亚军的《麦子》刻画了一位爱麦子如命、对世事怀有忧患感的大舅的独特形象,同当下那些忘却饥荒灾难、沉湎世俗享受的人们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还有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人物形象,如甫跃辉《秋熟》中的老龙太、翠妮祖孙俩,在古朴、丰饶的乡村秋景中,一老一少两个人物竟显得那样美好而凝重,他们的善良、淳朴反衬了世人的卑俗和虚伪。再如马金莲《鲜花与蛇》里的农村少女阿舍,小说在琐细平淡的农家庭生活画面上,呈现出一位勤劳、质朴、贤惠的传统女性形象。又如万玛才旦《乌金的牙齿》中的少年活佛乌金,在“我”的眼里和心里,褪去了神秘色彩,闪露着美好的人性和人情。

也许是由于当下小说人物的薄弱和造作之弊端,有些作家开始探索纪实小说,塑造写实人物,有人称之为“非虚构文学”。邵丽就是在这一条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的青年作家。她的《挂职笔记》记叙的是作家在河南某县挂职副书记时所

熟悉的几个人物:副书记祁福旺、小车司机刘三召、政府食堂大师傅王三炳。人物性格的鲜明,生活细节的有趣,裹挟着人间的烟火和现实的“生猛”扑面而来。《老革命周春江》塑造了一位逼真、坚实而丰满的县委副书记形象。他没有文化,思想守旧,但资历深,工作认真,廉洁刚正。因离退休问题解决不当,他怨气很大,多次上访;但他对党、对革命忠贞不二,为当下的社会问题忧心忡忡。一个质朴、赤诚、执拗而又狭隘、盲目、愚忠的老革命形象跃然纸上。只有在生活的泥土深处才能发掘出这样的人物来,只有用纪实的手法才能雕塑出这样的人物来。这样的人物形象具有原创意义。但另一方面,由于作者过分粘滞于生活原型,使这一人物缺乏艺术形象应有的纯粹与和谐,难以达到典型的高度。

历史题材的发展

短篇小说不仅擅长描写现实生活,同时适宜书写历史生活,表现历史题材。上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也不时出现一些历史题材作品,但数量较少,构不成阵容。2011年我们欣喜地发现,历史题材在潜滋暗长,数量在增加,质量也在提升。历史题材的发展,显示了短篇小说表现领域的扩展和作家艺术视野的开放。聂鑫森、孙方友、谈歌等人在这一领域卓有成就,不断有新作问世。现在又有一批作家在跟进,且显示了新的创作特色、艺术生机。诚然,当下的历史题材短篇小说,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,譬如取材还不够开阔、多样,思想观念还不够新颖、深刻,还需要不断提高。

古代历史题材,由于时代久远、生活隔膜,在创作上有相当难度。只有那些熟悉某一时期、某一领域生活的作家,在短篇小说艺术上又有一定造诣,才可能写出高质量的作品来。叶广芩出身满族,是叶赫那拉氏后裔,不仅对清王室家族生活有深广的了解,而且有与生俱来的情感渊源,因此创作了众多古色古香的家庭系列小说。2011年的《后罩楼》就是一篇出类拔萃的艺术精品。作品描述的是清王府后花园的故事及珍品格、奶奶黄老婆子的生活,但并没有定格在已逝的清代,而是一路扫描了这座花园和这些人物,从清朝、民国、新中国特别到“文革”时期的遭遇和变迁。故事扑朔迷离、引人入胜,作者反思尖锐,思想深刻。

中国现代历史,充满了腥风血雨和革命、战争,其实也是一座文学的富矿。葛水平的《第三朵浪花》和鲍十的《东北平原写生》,都表现了20世纪40年代的土改运动,是现代历史题材上的突破。

中国的当代历史已有60余年,新时期之前的近30年,也可视为历史。2011年我们看到了多篇描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的作品,虽然大抵是一些日常生活的“小叙事”,但依然有着特别的思想和审美价值。迟子建的《七十年代的四季歌》以童年回忆的方式,叙述了原始、贫困、杂乱的历史背景下,“我”自由、快乐的儿时岁月,温暖、丰富的底层社会生活,以及有着勤劳、善良、正直品格并敢于抗争的老一辈人形象。荒凉的历史时代,竟有着缕缕温馨的记忆。毕飞宇的《一九七五年的春节》同样把画面锁定在童年记忆上,那位既“高贵”又“倒霉”的县宣传队名演员,她悲切而怪异的神情举止、她在召唤阿花时失足落入冰窟窿中的挣扎与“舞蹈”,都给“我”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,也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思考。

叶兆言的《写字桌的1971年》写的是童年故事,透过一张古旧的写字桌的流转,折射出当时的社会动荡、黑白颠倒、人际恩怨,特别是文化人戏剧性的命运沉浮。在这类小说中,最具有历史反思意味的是秦岭的《杀威棒》。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,过去的作品一般都是站在知青立场上审视的,而在这篇作品中,作家是站在农民立场上观照的。民办教师曹尚德手中的蛇皮教鞭,以杀威棒般的气势和力量,打掉了城里娃甄文强以及他的知青叔叔在农民面前的优越和傲慢,使他们真正认识了中国社会和农民,成为他们人生的财富。而在城里娃的聪明和他们后来的成功中,农民也认识了知青和城市文明。这种认识其实是双向的。对历史的认识,是一个不断深入、建构的过程。短篇小说在这一题材上是大有可为的。

表现形式的探索

实事求是地说,现在短篇小说在表现形式上已很成熟,比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短篇小说,有了明显的进步和提升。在故事编织、人物刻画、结构营造乃至视角选择、叙事方式、手法运用等方面,显得驾轻就熟、游刃有余。短篇小说似乎有了一种通用的、有效的表现模式。一种文体有了一种模式,自然是成熟的标志,但同时也是僵化的开始。近年来,在短篇小说领域,已经看不到在艺术形式上的创新潮流,在表现方法和手法上也似乎“山穷水尽”了。这一文体的创造力在衰退。短篇小说本是小说家族中的“探索者”,它在艺术上的保守僵化,直接制约了整个小说创作的变革和发展。

在艺术表现方法中,荒诞手法可谓是一种神奇、有力的现代“武器”,近年来在短篇小说中多有运用。余同友的《老魏要来》是一篇表面写实、内涵荒诞的短篇小说佳作。办公室的老职员们绘声绘色描述的、领导们热线联系的、新职员们焦急等待甚至亲身寻访的——曾在这里工作过的老魏,竟然是一位臆造、虚幻的人物。他是一个象征、象征着局内人共同守护的体制潜规则,象征着调节人际关系的润滑剂,象征着小官吏们刻板生活中的一抹晨光。一个荒诞形象照彻了机关生活的昏昏晃晃,他与贝克特笔下的“戈多”可谓异曲同工。范小青多年来创作以“寻找”为主题的短篇小说,颇受文坛关注。新作《寻找卫华姐》再次演绎了这一主题。小说以既真实又荒诞的生活情景表现了这样一种认识:不管是在网上还是在现实中,我们所寻找的人和事,已不再是原有的对象,当真正的目标出现的时候,我们难以相信,或者擦肩而过。小说传达了现代人寻找、困惑、厌倦的时代情绪。

在2011年的短篇小说中,我们还看到了作家对幽默、讽刺、反讽等手法的纯熟运用,显示了短篇小说叙事风格上的多样,以及作家创作心态上的开放。劳马的讽刺小说已成为当前文坛上的一朵“奇葩”,他的作品题材广泛、笔调写实、构思精巧、篇幅精粹,在不动声色里蕴涵着幽默,在温文尔雅中深藏着讽刺。《上火》《东北人》《年货》《陪读》《奖励》《输与赢》《幸福百分百》等,构成了一幅斑驳陆离的世相图,显示了作家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天才的讽刺艺术。

艺术创新并不只是形式表现问题,同时关乎思想内容。独特的内容要有新颖的形式去表现,新颖的形式又创造性地表现着独特内容。当艺术形式的探索和创新成为一种文学潮流的时候,一种文体才会产生突变,走向复兴。短篇小说艺术探索的天地是广阔的,从当前的创作实际来看,西方“现代派”以及后现代文学依然是一个涉足不深的领域,中国古典文言、白话小说则是一个亟待开发的矿藏,五四文学、十七年文学乃至新时期文学,仍有可资借鉴的资源,短篇小说完全可以从中找到最理想的工具,并铸造出一种全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手法来。

短评 优美而智慧地书写城市

□蔡东

的品质。

《所有的花都是梧桐山开的》是一部挑战难度的作品。深圳是一座公认的没有过去的的城市,邓一光恰恰写出了簇新都市的历史感。小说里,为考察花木的来历,网站编辑来到梧桐山采访隐居的土著。围屋里氤氲着工夫茶的芳香,在老者平静的叙述中,逃亡的惨烈岁月破空而来,几千字的小说举重若轻,充盈着史诗般的荡气回肠。梧桐山成为通向历史的奇妙入口,这里有品名繁多的奇花异草,这里也曾是求生的起点,或者永久的葬身之地。小说标题散发着动人的诗意,这是一首寻根溯源的长诗,一个探讨生死的哲思小品,也是一部中国式生存的备忘录。

而要解读《仙湖》在另一个地方熠熠闪光,首先要明白何谓“仙湖”。在深圳,梧桐山谷,仙湖之上,弘法寺遗世独立,远离浊世恶苦。仙湖是一个清净的菩提道场,化解积存的怨戾之气。无法想象,没有寺庙的深圳将是何模样。在日本地震、核辐射的世纪灾难到来时,离异的男女重聚于仙湖民居,试图从有轨生活中逃逸而出。但是,改变的只是生活形式而已,情感依然漂浮失重,两人身居仙湖之畔,心却留在了尘世。小说对人物没有明确交代,情节飘忽无定,弥漫着迷离的气息,如《倾城之恋》般流动着不安的情绪。作家借助小说提出了有质量的疑问:当物质享受已格外充足,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却仍然很低,栖居和筑居的距离分外遥远,人心何时才能真正抵达仙湖?

第二类小说的共性在于:现实的题材、现代的叙述、先锋的气质、寓言的品格,散发出内倾的神秘的气韵——像关于深圳的一场场梦,具有形而上的色彩、多重解读的不确定性、宽广的阐释空间和无法言尽的复杂意味。同样反映住房之痛,《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》与《蜗居》的艺术品格迥然不同,前者兼具问题意识与美学功能,以出世的笔法来做入世的小说,形式别致而精美,与现实意脉相连,又灵巧地飞离了现实,像一颗沉潜在时间深处的祖母绿,光华内敛。

轻盈跳脱的叙述、身份不详的人物、敞开的结尾,使上述小说喷薄出一股不受约束的狂野气。邓一光对小说的理解是通透的,也是深刻的。他反叛平庸的艺术形式和笨拙的现实主义,当讲故事蔚然成风时,作家们令小说肥大臃肿、不堪回味时,他更懂得舍弃和留白,用幻觉和梦境点染城市,用象征和隐喻影射现实,形成一种真幻掺杂、虚实相生的文本质地。他又似乎具备神奇的异能,能与植物、水鸟、昆虫进行神秘的交流,作品里弥漫着物我交融、接通天地般的梦幻、超逸和辽阔。

城市书写有相当的创作风险,因读者太熟悉,对素材的处理更强调慧心和才情。邓一光兼有丰厚的阅历、天赋的艺术感觉、稳定的小说技巧和成熟的社会人格,已齐备了书写都市并构建一座审美世界的素养。

人们常有先入之见,认为深圳的文学素材并不丰饶。事实上,即使放诸世界范围,它也是一座独特的城市。人们从内地南迁至此,身心往往受到剧烈冲击,这就具备了浓烈的文学性。在这里,邓一光呈现出喷发式的创作状态,原来此地的文学材料如此富足,美玉如斯,可堪琢磨,遍地小说,火花四溅。邓一光于深圳文学界的的意义,不是名望、领军之类,而是具体创作上的启发和开示。写得浮泛,写得陈旧,写得滥俗,罪不在城市。新城的文化内蕴不足,但这里的创作资源并不匮乏,匮乏的是提取能力、艺术识见、思考力度和开拓书写空间的勇气。

新作快评

王昕朋《村长秘书》,《朔方》2011年12期

过尽千帆皆不是

□潘德宝

王昕朋的《村长秘书》叙事之工,颇具曲径通幽之妙。小说不以全知视角叙述,没一开始就把盘托出、直奔主题、命中切中。

小说开篇,主人公大学生村官杨东东跟着村民刘小芹入村赴任,而刘小芹却以为是流氓尾随,手持砖头以防万一。青年男女闹了一点小误会,颇有心理张力与喜剧效果。也许有读者会误以为这是乡村爱情小说,因为开头往往就定下了小说的基调,但是这篇小说并非如此,这就有引人入胜之功了。

待得大学生村官见了村主任,乌烟瘴气之中,被任命为村长秘书。这里又是恶狗,又是恶言,可以理解成乡村干部的另类下马威:这是对异乡人进入乡村权力层的警惕。这令大学生村官颇为不满,准备要向上级镇委员汇报。根据阅读经验,读者也许会误以为小说是描写村与镇之间的权力之争,但是小说也非如此,这就颇启人疑窦了。

再到大学生村官在山花烂漫中见了村支书,颇有一番如沐春风之感。老支书交待了全村情况以及全村发展的矛盾所在。大学生村官很有一番壮志,似乎想要用自己的学识,让落后的山村脱贫致富。但是,读完小说之后,这种印象也并不全面。

直到小说故事的高潮,才让读者感觉抓住了主题。民全村主任要求全部村民种烟叶,因为村民抗命不遵,村主任叔侄二人便叫了推土机来铲平麦苗。这时小说中预埋的伏笔一齐都活了过来。小说开头刘小芹担心自己家里的麦子长腿“跑了”,实在事出有因;村民随身携带一根棍子,原来就是为了提防村主任家的恶狗;而村主任家名其恶狗为“二